

名称：199系列

作者：陈大伟

请各位读者留意！本人保留版权。各位请勿擅自储存或复制给别人。愿神祝福和监察各位读者！

「谨以这系列十二篇文章献给二百年来为中国基督教事工缘故牺牲自己和家人利益和性命的西方宣教士。」

## 目 录

第一部分：三地初期的基督教发展

第一篇	<u>台湾</u> 的失败教训	<a href="#">跳至</a>	第 02 页
第二篇	<u>澳门</u> 位置被取代	<a href="#">跳至</a>	第 04 页
第三篇	<u>香港</u> 的后勤基地	<a href="#">跳至</a>	第 07 页
第四篇	08 年的复活节	<a href="#">跳至</a>	第 10 页

第二部分：四个国内教会于二十世纪面对的逼迫

第五篇	义和团事件反省	<a href="#">跳至</a>	第 12 页
第六篇	成败皆系于西方	<a href="#">跳至</a>	第 14 页
第七篇	西方宣教士四散	<a href="#">跳至</a>	第 16 页
第八篇	文化大革命反思	<a href="#">跳至</a>	第 18 页

第三部分：四个笔者对廿一世纪华人教会的期望

第九篇	W敬拜適切化	<a href="#">跳至</a>	第 20 页
第十篇	I 教导深入化	<a href="#">跳至</a>	第 22 页
第十一篇	F 团契合一化	<a href="#">跳至</a>	第 24 页
第十二篇	E 福音国际化	<a href="#">跳至</a>	第 26 页

所谓「199系列」意思是基督教(或称更正教)来华199周年。1807年「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按立马礼逊牧职,并且差他往中国传福音。明年(2007年)是他来华二百周年,亦是基督教来华二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笔者特意于今年(2006年)写作「199系列」,除了纪念马礼逊和那些二百年来为中国福音事工缘故牺牲自己利益和性命的西方宣教士之外,笔者亦希望藉此分享对二百年来中国宣教事工的一些意见。笔者不是甚么基督教专业和资深学者,笔者不敢对二百年来中国基督教历史作出具体和深入的详细描述和评论。笔者只是运用自己有限的圣经和历史知识就着二百年来一些重要事件作简单的评述和分享一些愚见。至于二百年来具体和深入的中国基督教宣教历史则留待其它人作详细的描述和评论。

如果我们提及中国基督教的宣教历史时,很多信徒会以马礼逊于1807年来中国开始计算;但是请恕笔者问各位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你们是否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各位读者请放心,这个问题不是笔者帮任何人或团体作政治审查;因为这个问题除了牵涉到政治和民族性之外,还牵涉到中国宣教历史。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很多信徒似乎遗留或忽略了马礼逊来华之前一百八十多年,有荷兰宣教士曾经在被荷兰侵占的台湾传扬基督教的福音。这段历史被很多华人和西方信徒遗留或忽略,原因可能是传福音的时间甚短(只有卅五年)亦可能是之后基督教于台湾失去踪影,对日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宣教事工没有任何影响、更可能是很多基督教学者和宣教士忽略这段历史,以致很多信徒都不知道这段宣教历史。虽然,笔者写这个系列的目的是纪念1807年之后为中国福音事工缘故牺牲自己的西方宣教士,这段短暂和被很多人遗忘的台湾宣教历史对这年之后的中国宣教事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为了使更多主内肢体知道这段鲜为人知的宣教历史,并且作为后世的鉴戒;笔者仍然愿意简述这段短暂的宣教历史,并且分享一些愚见作为主内的交流。

十六世纪开始,因着航海路线的发现,有些欧洲国家派遣船队来到东南亚意图增加殖民地和扩展经济贸易。1557年葡萄牙占领澳门、1565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到十七世纪初,一个在欧洲建立不久的国家—荷兰亦意图来东南亚分享利益,1602年荷兰于巴达维亚(雅加达)成立具有政府职权的「东印度公司」,并且以此为基地入侵澳门和澎湖;但是都未能成功。到1624年「东印度公司」侵占台湾,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干治士牧师(Rev. Georgius Candidius)亦于1627年到达台湾。据《台湾基督教史》(北京九州出版社)描述,干治士牧师起初因着台湾原住民聪明机智、记忆力强和性情温顺等特征认为台湾的传教前景非常乐观。后来他才发现台湾人深受旧习俗和巫师信仰所影响。后来「东印度公司」派遣尤纽斯牧师(Rev. Robertus Junius)于1629年来台湾与干治士牧师同工。之后因着台湾人经常杀害当地的荷兰人,于是「东印度公司」于1635年武力征讨北部村落,然后讨伐南部村落,尤纽斯担任随军牧师。结果很多村落归顺荷兰人,尤纽斯牧师召开会议与他们缔结条约。之后福音于台湾急速发展,受洗人数数以千计,那时尤纽斯牧师说:「武力征服的效果是多么令人满意……在如此广大的地域里,神敞开了异教皈依的宽广的大门。」

随着其它宣教士的到来,干治士牧师和尤纽斯牧师相继于1637和43年离开台湾,他们离开之后基督教事工发展缓慢。到1651年,荷兰殖民者因着某些原因苛征重税,加上宣教士失却美好见证,以致反荷暴动经常发生。到1662年,郑成功带领军队攻占台湾。因为他怀疑宣教士有其它秘密任务;于是他杀害和遣回这些宣教士,基督教于台湾的卅五年事工亦正式划上句号。到

二百年后的1865年才有宣教士再次到台湾传福音。

笔者不敢否定于治士牧师、尤纽斯牧师和其它荷兰宣教士于这卅五年里对台湾宣教事工所作出的贡献；但是使笔者觉得失望和痛心的是众多宣教士于这卅五年对基督福音所作出的努力竟然对后来的台湾基督教事工完全没有帮助。那些数以千计的受洗台湾人都放弃基督教信仰。即使当中可能有坚持信仰的信徒，他们的事迹都不见于任何文献里。当中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荷兰宣教士借助「东印度公司」的权势威吓台湾人相信基督教，这样只会带来表面和短暂的相信；当台湾脱离荷兰人统治之后，他们实时放弃基督教和寻回昔日的信仰。其次，他们未能训练台湾信徒成为属灵领袖和牧者；以致他们离开台湾之后，即使有忠心的台湾信徒都会因为受逼迫和缺乏牧者而随流失去。最后，荷兰宣教士不能够在台湾做美好的见证和得到当地人的信任；以致郑成功攻占台湾之后因为不相信宣教士和基督教而将他们完全逐出台湾。

根据位于台湾的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的资料显示，1865年英国长老会差派宣教士马雅各医生（Dr. James L. Maxwell）到台湾南部作医疗布道，第二年便有四位台湾信徒受洗，基督教宣教事工于当地从此继续发展。去年（2005年）很多台湾信徒庆祝「台湾宣教140年」。宣教士带医疗工具布道比带枪炮布道更有果效，武力征服的效果纵使多么令人满意，也只不过是表面和短暂的。十七世纪荷兰宣教士于台湾宣教的失败正好给来中国布道的宣教士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惜的是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宣教士都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以致历史不断重现；所以，笔者希望分享这段鲜为人知的宣教历史作为以后中国和世界宣教事工的一个鉴戒，使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

■回到目录



伯驾 (Peter Parker, 1804-1888)

美部会宣教士伯驾于1834年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个以福音传道的医生。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首间基督教医院「博济医院」，深受中国人民信任。该医院亦是后来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运动的基地。伯驾的医术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当中包括梁发。后来，梁发经常到博济医院传道和分派福音出版物。1844年，中美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即在伯驾的翻译下促成。

郭士腊 (Karl F. Gutzlaff, 1803-1851)

德国人郭士腊是学者、医生和探险家。1830年他到达澳门，成为欧洲大陆和信义宗首位来华宣教士。他随着英国商船周游于沿海一带布道。他所主编「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中国境内最早的基督教中文期刊，他亦在广州发起了「在华应用知识传播会」，介绍西方文艺科技。他在沿岸以派单张形式布道，他亦翻译圣经。他所翻译的圣经，称作郭士腊译本，成为后来太平天国洪秀全所使用之圣经。郭士腊是一位极具争议的宣教士，他主要任职于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除了宣教工作之外，他亦参与刺探军情，为中国基督教宣教事工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

叔木士和罗考全

他们是分别于1836和37年抵达澳门的美国浸信会宣教士。1842年他们和邻为仁往香港开展宣教事工。

除了上述宣教士之外，还有伦敦传道会和基督教第三位来华宣教士，接替米怜从事文字工作的麦都思 (W. H. Medhurst)；1840年于澳门开展医疗事工，并于1842年将事工迁往香港的合信医生；美国美部会第二位来华宣教士，与裨治文同年来到广州的雅裨理和1827年往马六甲改进华文圣经印刷技术的戴耳(戴德生的岳父)等，基于篇幅所限不便详述。对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宣教历史的其它事件，各位读者可以参考其它书籍和资料。反而笔者想在这里分享一些宣教事工的意见，当中牵涉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马礼逊来华宣教时担当重要位置、鸦片战争之前很多来华宣教士都在这里发展事工、却在战争之后被宣教士忽略的澳门。

鸦片战争之前，澳门是唯一容许外国人自由居住的华人地方，所以很多来华宣教士都选择澳门居住；但是基于天主教于这个葡萄牙殖民地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宣教士于当地不受欢迎。当时满清政府对外国人入境有严格限制，马礼逊由于是「东印度公司」雇员才可以在广州居住，但是妻子和儿女只可以住在澳门。基于这些原因，有些宣教士只可以在被监视之下在澳门发展基督教事工、有些宣教士则在南洋一带做后勤支持和等待来中国，第一间华人基督教学校「英华书院」亦要在远离中国和澳门的马六甲成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城市为通商口岸，并且割让香港岛给英国。从此宣教士可以在这些地方传福音，当中很多宣教士往这五个城市，亦有部分宣教士往香港，却没有宣教士留在澳门。一些教会事工(例如：英华书院)亦由澳门和南洋迁往香港和这五个城市。香港方面长洲浸信会和道济会堂(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合一堂)于1843年开基，崇真会(前身是巴色会)救恩堂于1852年被建立。这三间教会是香港最早成立而现在仍然存在的华人教会。反观比香港早三十多年发展基督教事工的澳门，在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事工呈现真空状态达五十多年。到1898年才有香港道济会堂的牧者往澳门开荒，并且于马礼逊来华99年的1906年建立志道堂(中华基督教会志道堂)。它比澳门浸信教会迟两年被建立，成为头两间于澳门建立的基督教会。

造成这么大差别的原因有很多，当中一个主要原因可以从经济贸易角度分析。当时在西方政府和商家的心目中，中国是主要的经济贸易对象，澳门和香港只是当中的中转站。同样当时在西方差会和宣教士的心目中，中国是主要的宣教对象，澳门和香港只是当中的后勤基地。分别在于经济贸易方面英国是欧洲大国，香港有优良的港口；所以鸦片战争之前澳门是唯一的中转站，鸦片战争之后香港渐渐取代澳门的经济贸易位置。同样在宣教方面基督教受到香港的英国殖民地政府欢迎，却不受到澳门的葡萄牙殖民地政府欢迎；所以鸦片战争之前澳门是唯一的后勤基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亦取代澳门的宣教位置。从经济贸易和宣教角度来看中国都是最终目标，鸦片战争之前澳门是唯一选择，鸦片战争之后香港是比澳门优胜的选择。优胜劣败和此消彼长的情况可见一斑。

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很多商家带着人员和资金往台湾和香港，却只有很少人员和资金往澳门；很多宣教士带着信徒和资源往台湾和香港，却只有很少信徒和资源往澳门。澳门因为缺乏技术、资源和竞争力，所以旅游和赌博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澳门因为缺乏宣教士、资源和宣教策略地位，所以宣教事工发展缓慢。澳门的企业很多都是港资的，澳门的教会很多都是香港支持的。如果香港信徒因为澳门的经济主要倚靠赌博、澳门的宣教困难和基督徒人数偏低而贬低澳门、称呼澳门为「撒旦的温床」和「福音的石头地」，这样对澳门是否公平呢？

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华人地方比较，澳门是二百年来最早有华人信徒受洗的地方(1814年蔡高)，却是最迟建立基督教会的地方(1904年澳门浸信教会)，两件事情相差接近90年。澳门曾经是宣教士和资源投放比率最多的华人地方，现在却是基督徒比率最少的华人地方。根据2005年3月的「全澳基督教会中文主日崇拜人数」统计，结果是三千八百多人，与四十六多万的澳门人口比较比率是0.8%。聚会人数比率比曾经饱受「文化大革命」推残的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地方还要低。甚么原因造成上述现象呢？是否可以单以澳门人心硬和「福音石头地」来解释呢？和澳门天主教会有没有关系呢？和西方差会的宣教策略有没有关系呢？和澳门的经济结构有没有关系呢？香港与澳门只有江河之隔，与其它地方比较香港信徒和牧者是最适宜支持澳门基督教事工的信徒群体，我们应该怎样响应呢？愿将这篇文章分享给主内肢体知道作为主内的互勉。

■回到目录

### 第三篇 香港的后勤基地

不论中国大陆抑或香港，有两件事情对两地都有深远的影响，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相差超过一百年。除了基督教事工之外，这两件事情对两地的经济贸易和其它方面同样有深远的影响。第一件事情是1842年的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第二件事情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之后一年的韩战。对于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笔者相信很多香港读者于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但是为防你们已经忘记，笔者仍然概括地描述一次。英国为了从经济贸易中赚取大量外汇，于是藉「东印度公司」(马礼逊藉任职这间公司于广州居住)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导致中国大量白银流失。于是道光皇帝于1838年派林则徐往广州查禁鸦片，著名的「虎门销烟」便是在这个情况下发生。后来有一位英国水兵在九龙尖沙咀杀害村民林维喜。朝廷要求交出凶手，遭英方拒绝。于是林则徐驱逐英国人离开澳门。英国政府以英国人生命受威胁、通商受限制和英国国旗受侮辱等理由出兵。1840年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战败的中国被迫于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赔款、割让香港岛和开于五个城市为通商口岸，香港的殖民地历史从此展开。基督教从此可以在这些地方自由传播，但是中国亦从此屡次被列强侵略，中国人亦从此视基督教为西方列强侵略的工具。

正如第二篇所说，由于基督教是英国的国教；所以基督教宣教士于香港受到欢迎，澳门于中国宣教方面的位置亦被香港所取代。虽然如此，并不是所有来中国宣教的差会都会以香港作为后勤基地。当宣教士于中国的人身安全越来越受到保障之后，有些差会可能会直接于通商口岸建立基督教事工、有些差会亦会将起初于香港建立的事工迁往广州或其它地方。当内地出现暴乱时他们才会往香港避难。香港开埠初期于香港建立基督教事工的有伦敦传道会、美部会(这两个差会的香港堂会后来并入「中华基督教会」)、美国浸信差会、瑞士巴色差会(后来的「崇真会」)和「圣公会」。据刘绍麟所写《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1842-1866年的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出版)和一些网页的描述，这些差会于香港开埠初期的基督教事工概述如下：

伦敦传道会：香港开埠之后，合信医生将医疗事工由澳门迁往香港。由于香港比中国其它地方较为安全，所以差会决定将「英华书院」由马六甲迁往香港。华人教会(后来的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合一堂)依附学校建立，1845年供华人和欧洲人士使用的佑宁堂落成。后来医疗事工迁往广州，香港的医疗事工停顿。之后曾经有宣教士提议将香港所有事工迁往广州和上海。后来由于差会满意香港事工的发展，加上内地接连发生暴乱，宣教士才没有再提迁往内地。起初差会将「英华书院」迁往香港的目的是希望在安全和自由的空间训练传道人，却想不到训练出来的学生被吸引往商界发展。感恩的是很多任职商界的毕业生后来成为华人教会的骨干。

美国浸信差会：1842年叔末士、罗考全和邻为仁往香港开展事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除了在香港兴建了两所教堂之外，宣教士和华人宣教师于土瓜湾、长洲(后来的长洲浸信会)和坪洲建立外围据点。后来还建立两所学校和潮语神学班。当时浸信会的增长速度叫其它差会羡慕。后来由于叔末士和罗考全往广州开展事工，加上经费不足，差会于是停办一些堂会和事工。由于邻为仁精通潮语，于是潮语事工成为后来香港宣教事工的主力。到1850年代差会于潮州建立宣教事工。由于两个地方难以兼顾，于是潮州成为后来宣教事工的主力，香港的事工日见萎缩。到1861年，差会将总部由香港迁往汕头，并且出售香港所有物业，于是香港变成差会潮州宣教事工的外围据点。除了长洲浸信会之外，其它教会事工几乎停顿下来。到1870年代「美南浸信差会」接办香港的宣教事工，教会才重新得到发展。

美部会(属于美国公理宗的差会):这个差会可以说是最早来香港建立宣教事工,亦是最早将宣教事工迁出香港的差会。鸦片战争之后裨治文和其它差会宣教士往香港发展宣教事工,并且兴办教会、学校和诊所。差会总部虽然同意于香港建立宣教事工,但是他们希望于内地通商口岸建立教会和神学院。1844年中美两国签署「望厦条约」,美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购地兴建教堂和作殡葬处。在美国宣教士的安全得到保障之下,差会于是将香港事工迁往广州,他们在香港的建筑物亦卖了。到1883年,差会按旅美华侨会友的要求差派喜嘉理牧师来香港建立教会,同年年底国父孙中山先生和同乡陆皓东于该会受洗成为第一批新葡。这间教会便是后来的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

瑞士巴色差会:鸦片战争之后差会才差派宣教士来中国。据崇真会救恩堂的网页透露,1846年瑞士「巴色差会」差派韩山明和黎力基两位牧师来中国,1947年初他们抵达香港。1851年初韩山明牧师在上环街市附近租屋成立客家人教会。1852年韩牧师获政府批予西营盘第三、第四街地段成立教会。这间教会便是后来的崇真会救恩堂。内地事工方面,他们于东莞李朗的客家村和深圳布吉建立教会和神学院。1856年当地发生暴乱,宣教士暂时撤退往香港。

圣公会:香港开埠初期英国国教圣公会于香港的事工包括维多利亚教区的圣约翰主教座堂、宗旨是以香港为基地训练华人宣教师去内地传福音的「圣保罗书院」和欧洲籍海员教会。这些事工的对象都不是香港的华人。后来「圣保罗书院」和「英华书院」一样由宣教师训练学院变成政府资助的普通院校,「圣公会」于香港的华人宣教工作亦由该学校的学生福音工作开始。到1860年代,由于学校的教堂不敷应用,圣公会圣士提反堂便于1866年被建立。

我们可以从这五个差会于香港开埠初期的事工发展中看见香港和澳门一样都不是差会和宣教士的最终目标。不同的是香港是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殖民地,加上中国内地经常出现暴乱;所以一些差会仍然以香港为中国宣教事工的后勤基地,香港基督教事工亦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量差会、西方宣教士和华人信徒逃离中国;台湾和香港便成为他们最主要的避难所。美北浸信差会(前身是美国浸信差会)重回香港。宣道会、美国卫理公会和一些宗派总会由于需要牧养移居香港的信徒,加上大量大陆难民移居香港;所以他们积极发展香港的福音工作,现在香港很多基督教宗派都是1949年之后才在香港建立教会的。

香港在中国宣教事工方面经常担当后勤基地的角色。当国内社会环境稳定和宗教自由时,宣教士便会从香港往内地宣教;当国内出现社会动乱和宗教压制时,宣教士和信徒便会往香港避难,之后情况好转时可能会重回旧地。这种情况在百多年的宣教历史中经常发生,1949年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79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基督教在受到严格限制之下继续发展,基督徒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奈何国内官方教会在牧者、信徒领袖、财政、神学书籍和资源方面都严重缺乏,鉴于国内宗教政策缘故外国信徒不能够直接介入和帮助。如果我们将台湾、香港、澳门三地作比较;台湾和中国仍然处于两个政府分治局面,加上路途遥远,所以台湾信徒比较难支持内地信徒;澳门很多教会都需要香港教会的支持,而且澳门信徒比率比内地还少,所以澳门信徒亦很难支持内地信徒;香港信徒于这方面可以担当重要的角色。虽然香港信徒亦受到国内宗教政策的限制;但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信徒在国内宗教服事和交流方面始终比外国信徒优胜,甚至外国基督教会和机构亦可以透过香港基督教会和机构支持国内信徒。昔日韩战之后中国断绝与其它国家的直接贸易往来,香港于是担当转口港角色。同样现在香港信徒可以以中国信徒身份和国内信徒进行地方宗教交流,外国信徒亦可以透过香港教会和机构将心意和支持带给国内信徒。香港可以重新成为国

内宣教事工的后勤基地，愿将这篇文章分享给各位肢体知道作为主内的交流和激励。

■[返回目录](#)

## 第四篇 08年的复活节

这篇是笔者于2006年所写「199系列」文章中的第四篇，这年的复活节是4月16日。有些读者可能会问：「今年是06年，为何不谈论06年的复活节或者07年的复活节而谈论08年的复活节呢？」其实，08年的复活节对于全球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来说具有很特别的意义、08年对于中国来说亦有很重大的意义、对于两岸四地(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和其它地方的华人基督徒来说，08年的复活节除了有上述两重意义外，还有第三重意义。笔者说了这么久，究竟这三种意义是甚么？就请让笔者一一道来。

### A. 最早的复活节

如果笔者不说可能很多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不知道，08年的复活节是公元325年之后最早的复活节。现在不论香港抑或欧美国家，每年都会有两个纪念耶稣基督的节日，分别是纪念基督降生的圣诞节和纪念基督受死和复活的复活节。圣诞节的日期固定于每年12月25日。复活节的日期却不是固定的，但是可以肯定复活节一定是星期日，耶稣受难节一定是星期五。据笔者所知，现在决定每年复活节日期的方法起源于公元325年第一次基督教(现在的天主教)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简单来说，决定复活节日期的方法是每年3月21日之后第一个「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3月21日是「月圆」之日，就顺延至下一个月圆；如果「月圆」之日刚好是星期日，就顺延至下一个星期日。依照这个方法计算，理论上复活节和3月21日相差最少两日(3月21日是星期五、「月圆」是之后一日、复活节是之后的星期日)，最多应该有卅七日(3月21日刚好是「月圆」、之后的「月圆」刚好是星期日、所以相差30+7日)；所以，复活节日期应该介乎3月23日至4月27日之间。刚好08年的复活节是3月23日；所以，08年的复活节是公元325年之后其中一个最早的复活节，我们于08年有机会以最早时间纪念耶稣的受难和复活。

上述复活节日期的计算方法适用于基督教和天主教，东正教不是用这个方法计算，请各位读者留意。复活节日期是3月23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那一年的3月21日一定是星期五，其次是那一年的3月22日一定是「月圆」之日。近二百年来只有两年的复活节日期是3月23日，分别是1913和2008年。如果笔者的历法资料没有错误，下一次复活节是3月23日的年分最大可能是2149和2160年。到时不要说大家已经离世，这个世界会否仍然存在和耶稣会否已经再来仍然是未知之素。所以，我们应该特别纪念这个一生人只有一次最早出现的复活节。

### B. 最大民族主办的奥运会

除了从天文历法角度来说08年的复活节具有特别意义之外，从体育和民族角度来说08年亦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因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性运动会—奥运会将会于08年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奥运会每四年举行一次，一直以来它都是世界瞩目的体坛盛事。08年奥运会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在亚洲举行(之前日本首都东京和南韩首都首尔都举行过)，乃在于它在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中国的首都北京举行。自从1949年中共掌权以来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对外封闭的国家，到1979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善。08年奥运会是中国第一次举行世界性大型运动会，届时很多国家的政要、运动员和旅客都会莅临出席。这是中国自49年之后最大规模开放给外国人莅临中国的行动，亦都可能是49年之后中共政府给予外国人在国内最大自由活动的机会。从文化交流角度来说北京奥运会可以帮助更多外国人认识中国，从宗教角度来说我们可不可以藉北京奥运会帮助更多外国人认识中国的宗教情况呢？我们亦可不可以藉北京奥运会向更多中国人传福音呢？

自从1979年开始中共政府对于基督教实施有限度的开放。虽然，国内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但是，基督教教牧人员于国内牧养教会和传福音都受到严格限制。香港和外国信徒在国内进行基督教活动同样受到严格限制；所以，08年北京奥运会可能是近年中共政府给予两岸四地(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和外国信徒在国内最大宗教自由活动的机会。当然，我们仍然不可以在北京和中国其它地方传福音和进行违法的宗教活动；但是，作为中国信徒的我们可以帮助外国基督教会和机构申请在北京和中国其它地方举行崇拜和宗教活动。除了可以进行宗教交流之外，亦可以帮助国内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更认识基督教和外国的基督教机构。正如本系列第三篇所说，香港信徒比台湾、澳门和外国信徒更适合与国内信徒进行宗教交流，亦可以担当中国和外个信徒的桥梁角色。同样在08年北京奥运会中，香港教会牧者和信徒可以协助国内宗教机构举办适合外国信徒的宗教活动，在传福音和宗教交流方面香港基督教机构亦可以担当中国和外国基督教机构的桥梁角色。

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第一次举行世界性大型运动会，亦是49年之后中国和外国人最大规模的交流机会。08年的复活节是北京奥运会之前两岸四地信徒最后一个纪念耶稣的节日。北京奥运会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从传福音和宗教交流的角度来看北京奥运会对于两岸四地信徒来说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08年的复活节对于华人信徒来说别具意义。

### C. 二百年后第一个复活节

除了是北京奥运会之前两岸四地信徒最后一个纪念耶稣的节日之外，08年的复活节另一个意义是基督教来华二百周年之后第一个纪念耶稣的节日。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所说，所谓「199系列」意思是2006年是基督教来华199周年，明年便是基督教来华二百周年。笔者相信很多华人基督教会和基督教机构都会于明年举行一连串活动回顾、庆祝、纪念和感谢二百年前神带领马礼逊来华揭开中国宣教的第一页。除了回顾、庆祝、纪念和感恩之外，我们是否应该为第三个一百年向神祈求异象和使命呢？08年的复活节是基督教来华二百周年之后第一个纪念耶稣的节日，亦是第三个一百年的第一个复活节；这个背景使08年的复活节别具意义。

还记得北京于1994年争取主办2000年的奥运会，后来由于澳洲的悉尼涉嫌用不正当的手段而以二票之差败给澳洲的悉尼。八年后北京再次争取主办2008年的奥运会，结果争取成功。笔者不知道为何神于当年容许澳洲的悉尼运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取主办奥办会成功；但是，笔者认为北京主办08年奥运会对国内基督教事工有很大的帮助。当07年华人教会和基督教机构为第三个一百年向神祈求异象和使命之后，08年北京奥运会便是我们实践这些异象和使命的第一个庞大媒介，我们可以将07年所定下的异象和使命在这个1949年之后中国最大规模开放给外国人莅临中国的活动中表现出来。08年的复活节于时间上夹在这两个华人信徒的重大事件中间，使这个复活节有承先启后的味道，加上这个复活节是公元325年之后最早的复活节；这些因素都使08年的复活节可能成为华人信徒用最特别心情纪念耶稣受死和复活的复活节。华人教会和基督教机构怎样利用这个最早的复活节收拾基督教来华二百周年的心情和迎接08年北京奥运会呢？这个正是笔者希望所有华人信徒思想的问题，愿将这篇文章分享给各位知道作为主内的互勉！

■回到目录

对于「义和团」，笔者相信很多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他们于十九世纪末期在中国广泛地区引发暴乱，袭击对象是外国人和相信被称为洋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中国人，造成重大的人命和财物损失。满清政府更藉「义和团」的帮助向外国宣战。结果造成八国联军之役和中国被迫签署「辛丑条约」，中国的民族尊严和自信再一次丧失。有些人认为他们是爱国英雄，为民族尊严牺牲自己；亦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好战暴徒，到处滥杀无辜。即使同样是中国人，站在不同角度亦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所以，笔者亦要小心处理对他们的评述。当年「义和团」自称刀枪不入，到后来却不堪一击。现在可能有些人会怀疑为何当年满清政府会相信和支持「义和团」；但是，当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境况时，我们或者会谅解当年他们的无知。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十分悠久；所以，很多中国人都以民族历史悠久自夸，他们常说「几千年历史文化」。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常常以为中国人比其它民族优胜；所以，他们称外国人为「蛮夷」、「洋鬼子」。十九世纪初期，当时的满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除了广州某些地方容许经商的外国人居住之外，政府禁止外国人进入，亦严禁他们传扬基督教和天主教，马礼逊和其它西方宣教士亦因为这个原因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来中国传福音；所以，有些宣教士留在澳门和马六甲做后勤支持的工作。另一方面，虽然满清政府屡次禁止输入鸦片；但是，因为官员贪污的缘故鸦片仍然继续输入。结果便出现著名的林则徐于虎门(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焚烧鸦片的历史事件，鸦片战争亦由此而起。讽刺的是当年马礼逊任职的「东印度公司」，正是将鸦片输入中国最多的公司。马礼逊传扬救人的福音，他任职的公司售卖害人的鸦片。两者成强烈的对比。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割让香港和开放五个城市为通商口岸。外国人从此可以在这些地方自由出入和经商，西方宣教士亦可以在这些地方自由传福音。1858年英法联军战役之后，英法两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可以在中国任何地方自由传教和游历。这两次战役无疑帮助基督教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播；但是由于基督教是随着外国军队和鸦片一同来中国的、有些宣教士担任英美两国的驻华官员、加上教会受到外国领事保护；所以对于民族意识强和未能抹去战败耻辱的中国人而言，宣教士和教会被误会是外国侵略分子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中国人有仇外和仇教情绪亦是理解的。

之后数十年中国长期受到外国的欺凌压迫。到十九世纪末期出现长期干旱，「义和团」散发谣言指是洋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使天不下雨，这些谣言使缺乏教育的农民更仇恨洋教。适逢当时有排外思想的毓贤任山东巡抚。他觉得「义和团」的仇外思想正合他意，于是任由他们散发谣言和袭击外国教士，因而引发多宗教案，他亦因为被撤职而更仇恨外国人，于是他往北京向权臣和贵族们游说和宣扬「义和团」是义士、有神乎其技和刀枪不入，朝廷可以利用他们来对付外国人。当时朝廷中很多王族和官员十分仇恨外国人，当中端王刚毅大权在握。他听到毓贤的游说之后相信「义和团」可以被用来对付外国军队，其它官员亦随声附和。他们还怂恿慈禧太后向外国宣战。当时有反对的官员被实时处决。即使光绪皇帝不赞成开战，无奈他没有实权，而且其它王族和官员都附和端刚开战。于是朝廷下令赞扬和赏赐「义和团」，暴乱亦蔓延各地。破坏设施、焚烧教堂住宅、围攻领事馆和残杀外国人和教徒等事件相继发生。最终导致八国联军营救和攻打北京，暴乱才结束。

「义和团」杀害五千多位基督教宣教士和信徒，很多书籍已经描述当中的惨况，篇幅所限笔者不能详述。这件事已经发生超过一百年，期间很多基督徒怒骂当年「义和团」为何会这般无知和凶

残，有些中国百姓却会赞扬他们是民族英雄。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笔者曾经观看著名导演李翰祥执导的「火烧圆明园」，当中有一幕描述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之后所作的暴行，例如：滥杀平民百姓、到处抢掠、强奸妇女和公然拍卖宫廷珍品。虽然，这些只是电影片段；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当年英法联军的确曾经作出以上暴行，而且可能更惨不忍睹。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不断欺压满清政府和百姓。英法联军战役之后，外国人和教会受到外国驻中国领事馆保护，不需要受到中国法律制裁，无形中宣教士和教会变成特权阶级。正如之前所说，在中国百姓心目中宣教士可能被视为外国侵略分子，教会被视为侵略工具；加上他们拥有以上特权，导致彼此之间的误会加深，教案亦因此频生。所以，当我们责骂「义和团」凶残时，他们的支持者反而会责骂当年外国人残害中国百姓；而且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与中国百姓受到外国人的伤害作比较，基督徒在「义和团」暴乱中所受的伤害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如果当年和现今的信徒要责骂的话，我们应该责骂当年欺压中国百姓的外国人(包括和香港有密切关系的英国)，而不是「义和团」。

当年「义和团」到处破坏和残杀无辜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外国军队侵略和残害中国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当年「义和团」中即使有爱国分子，却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宣教士和信徒；当年教会即使有爱心地向中国百姓传扬福音，却和伤害中国百姓的外国军队扯上关系。当中的是非对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很多人说西方的文化传统是法、理、情；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情、理、法。即使基督教信仰和教义是多么合情合理、福音是多么充满爱和拯救；中国人普遍看重基督徒本身，其次才是基督教信仰。虽然，我们常常说应该相信的是基督教信仰，不是基督徒；但是，中国文化传统有这些特性，我们不能完全抹煞。外国差会和信徒可能不明白在中国宣教为何要做这么多福利工作；但是这些便是中国人先讲情后讲理的习性。我们这些自幼受到西方教育影响而又承继中国文化传统的信徒应该明白。正如笔者于本系列第一篇所说：「宣教士带医疗工具布道比带枪炮布道更有果效」，愿「义和团」事件可以作为中国宣教事工的鉴戒，叫我们知道向中国人传福音不可以单讲教义信仰，亦要做社区工作建立关系。愿各位读者以后既熟读圣经和福音信仰，亦能够在众人面前作美好的见证。

■回到目录

八国联军战役之后，全世界踏入二十世纪。基督教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在中国受到认同，而且有些人因着渴慕西方文化而寻求教会的协助。五四运动之前的十多年时间可以说是基督教于中国最受欢迎的时间，五四运动之后情况却急转直下。中国人由于抗拒西方帝国主义而攻击基督教，期间出现两个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所以，二十世纪头三十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于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成也西方，败也西方」。

中国于八国联军战役中受到致命的打击。朝廷中的保守派已失去影响力，之前被打压的变法维新和引入西方文化运动又再被旧事重提。1903年朝廷命袁世凯训练北洋新军。之后在中国沿用千年的科举考试正式被废除，各省改办新式学堂。由于基督教传教学校是最早于中国设立新式学堂的团体，所以这些学校大受欢迎。那时由于基督徒和传教学校的学生受到宣教士的西方思想影响，以致他们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当中包括国父孙中山、陆皓东和陈少白等人。由于投身革命的基督徒人数众多，所以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很多基督徒担任政府官员，当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基督教亦因此与民国政府关系良好，不论政府官员和地方士绅都对基督教态度友善。

之后袁世凯称帝失败、军阀割据、中国重新陷入混乱分裂的局面。这些事件使当时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革命不能够带来国家的更新。原因是大部分国民都活在无知和沉睡中，他们不知道国家的形势和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这些知识分子认为若不打破旧传统，国民便无法觉醒。于是他们推动新文化运动、从事更治本和彻底的文化和社会革命、并且渴望从西方引入各种思想和学说。由于基督教被认为是「洋教」和西方文化的象征，所以基督教于当时大受欢迎。教会学校于当时被吹捧成贵族学校、一些教会聚会吸引很多人参加、一些教会团体亦推出一些救国的口号和聚会来吸引非基督徒参与聚会。基督徒人数由1900年接近十万人激增至1920年超过卅六万人。那时基督教事工因着中国渴望西方文化和知识而发展迅速，这种情况到五四运动之后才有急剧性的改变。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身分出席1919年初的「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和收回战败国德国租借的山东省主权等要求，却遭到会议其它国家拒绝。会议决定顺从日本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省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消息传出之后举国震怒，北京三间大专和其它学校的学生于五月四日举行罢课示威，遭到军警镇压。事件引起全国各地的激烈回响，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等示威。结果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出席和约的签字仪式。这就是历名著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有两种主要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不再要求救国的理论而要求实际的行动，他们重新从政治革命中寻求救国的具体实践方法和行动方案，中国共产党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21年成立。因为基督教着重先救人后救国，在时间和具体实践上都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急切要求，于是基督教的价值被他们怀疑。第二种倾向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高涨起来，并且反西方帝国主义思潮于「义和团」暴乱之后重新泛滥起来。当时刚成立的苏维埃政权的反帝国主义理论逐渐影响中国人，相反被认为是「洋教」和西方侵略工具的基督教则成为被攻击对象。加上二十世纪初期基督教积极发展的教育事工被指侵犯中国的教育主权，「非基运动」便是在这样思想背景之下发生。

第一阶段「非基运动」于1922年发生。当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在北京借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年会，一群上海学生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名义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借用中国的大学开会。他们通电全国各校要求支持，各地纷纷响应。后来北京学生成立「反宗教大同盟」，他们于四月九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当日于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非基运动」进入高峰期，到五月反教言论才逐渐沉寂下来。

第二阶段「非基运动」始于1924年，当时左翼国民党员和共产党不断鼓吹反帝国思想。同年八月上海一群青年重组「非基督教同盟」。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各界支持，各地纷纷响应。此次「非基运动」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经公开谴责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锋。这次运动由自发性的学生运动变为政党推行政策的工具。由于有政党的策划和推动，第二阶段的「非基运动」进行得极有步骤和规模。到1925年，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掀起了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怒潮。由于排外和反教情绪强烈、不少宣教士被迫离开中国、一些基督教设施被占据、一些基督徒被迫挂上「汉奸—洋人走狗」的牌子游行示众、甚至有信徒被杀。同年圣诞节期间各地都发生了教堂被占和传道人被殴的事件。传教学校亦出现集体罢课和退学等事件，学生人数大幅减少。到1927年，蒋介石展开扫除共产党和激进派行动，并且大力压制各地的社会运动，原本由政党推动的「非基运动」于政治压制下结束。「非基运动」的其它资料由于篇幅所限不能详述。

写到这里笔者想分享一些对中国宣教历史的感受。笔者于这系列第一篇中曾经描述十七世纪荷兰占领台湾时的宣教情况，当时宣教士藉军队武力征服帮助传福音。后来郑成功带领军队攻占台湾，基督教于台湾的卅五年事工正式划上句号。作为中国人而言，我们应该为着台湾脱离外国殖民统治而感到高兴；但是作为中国基督徒而言，我们应该怎样看这卅五年的宣教事工划上句号呢？笔者不知道十九世纪来华的宣教士是否知道这段历史，笔者却发现他们似乎没有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役发生之前，有些宣教士支持英国军事介入，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迫使中国开放更多地方让外国人居住和传福音。结果这些战役之后外国宣教士可以自由地于中国各地宣教，基督教于被外国领事保护的环境中得到发展；但是这些战役之后基督教是洋教、人民的鸦片和外国的侵略工具等负面印象根植于很多中国人的心中，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挥之不去。现在当我们细说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时，我们必须提及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役、「义和团」暴乱和八国联军战役等丧权辱国的事件。作为中国基督徒而言，我们应该感谢神藉这些事件帮助基督教于中国各地传播呢？还是应该质问神为何让中国经历这些丧权辱国的事件呢？这方面笔者亦很难给予一个完满确实的答案。笔者只是希望借着这篇文章向香港和全世界的差会、宣教士和信徒作出一个呼吁—请你们不要再借助武力发展基督教事工。如果你们所属的国家是侵略者或支持侵略者，你们应该寻求驻当时领事保护，却要 and 侵略军队划清界线(虽然有点儿矛盾，却是无奈的事实)。如果你们所属的国家不参与任何战争，你们更应该热心向世界各地传扬福音。「以权服人，服得一时；以德服人，服得一世。」愿台湾的失败教训和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负面印象能够作为你们的鉴戒。愿神祝福你们，Amen。

■回到目录

笔者于本系列第三篇中曾经指出有两件事情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基督教事工有深远的影响。第一件事情是1842年的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第二件事情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之后一年的韩战。前者的前因后果笔者已经概括描述，至于后者的前因后果则留待笔者现在作概括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成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1920年代中期的「非基运动」便是由共产党策划和推动。1927年蒋介石展开扫除共产党和激进派行动。到1936年因着「西安事变」蒋介石愿意和共产党继革命军北伐之后二度合作抵抗日本的侵略。经过八年抗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结束，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重归中国的怀抱。之后两年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内战一触即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国民党远走台湾继续中华民国的统治。次年南北韩爆发内战，苏联和中国支持北韓，美国和联合国部队则支持南韓。战争于1953年结束。有关国共内战和韩战的其它详细资料，由于篇幅所限不能详述。笔者亦相信各位读者有很多途径可以寻找相关资料。

当差会和宣教士意识到无神论的共产党即将执掌中国政权之后，他们开始将机构、宣教士和重要文件移往台湾、香港和其它地方。中共政府成立之后，政府扶植吴耀宗等亲共的基督徒成为国内的基督教领袖，并且发表「三自革新宣言」。原本国内的基督教团体和领袖亦被取代。1950年底韩战爆发，中国没收美国在华的资产，当中包括教会物业。中国解放之后坚持留守国内的西方差会和宣教士被迫撤退。1951年4月中共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为主席。同年国内基督教宗派开始割断与国外(包括台港澳三地)总会和基督教机构的关系，甚至联络亦中断。之后国内教会进行多次控诉大会和机构改组。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国内大部分教会都受其控制。次年10月中共宣布三自以外任何基督教活动皆属违法。这个便是中共政府推动的「三自运动」。其实，「三自运动」的最初构思者并不是中共政府，乃是西方宣教士。早在1900年「义和团」暴乱发生之后，一些西方宣教士已经帮助中国教会进行自治、自养、自传和本色化运动。这个便是后世人所称的「本色化运动」或「三自运动」。这个运动亦成为中国教会于1907年庆祝基督教来华一百周年的重要议题。至于这个名称和运动后来有没有被利用作其它目的则是后话。

国共内战之后西方差会和宣教士迁往台湾、澳门、香港和其它地方。在国共内战之前，台湾只有两间神学院，内战之后却增至1960年的十间。信徒亦突然之间增长超过一倍，一些宗派如浸信会、宣道会和信义会等亦于内战之后才在台湾建立教会和宗派机构，自此台湾教会主要分为闽南语和国语教会。至于台湾基督教于1865年之后和内战之后的详细发展情况，由于篇幅所限不能详述。澳门基督教事工于二次大战期间和之后有明显的发展。二次大战期间澳门没有被日本占领，于是很多逃避战祸的大陆难民住在澳门，香港圣公会有见及此差派牧者往澳门，他们分别于1939年和1946年建立马礼逊堂(基督教坟场附近)和圣马可堂，加上浸信会、志道堂、上帝五旬节会和四方福音会，内战之前澳门有六间教会。内战之后金马仑长老会的甘耀敬于澳门建立教会，三位华人牧者和领袖亦于澳门创立宣道堂。宣道堂可以说是澳门第一个本土宗派和华人自立的教会，亦是现时澳门最多堂会的教会，堂会数目有十多间。浸信会亦于内战之后积极于澳门建立教会和兴建学校。宣道堂、浸信会和圣公会可以说是澳门最大的三个宗派。令人遗憾的是描述澳门教会历史和事工的书籍极少，即使笔者往澳门浸信书局观看亦只有一至两本，数目之少使笔者甚为诧异。

内战之后大量西方宣教士涌入香港。当中由于很多差会害怕中共政府会南下解放香港，所以他们都要求宣教士和同工于短期内离开香港，当中包括笔者所属的宣道会；但是由于一些宣教士眷恋华人宣教事工，并且有南下香港的华人牧者极力争取；所以，一些差会后来都愿意于香港建立事工。当中美北浸信差会(美国浸信差会)重回香港建立潮语浸信会，之后这些潮语堂会加上美南浸信差会辖下堂会于1938年成立的「香港浸信会联合会」。至于另一宗派—循道宗，美国卫理公会由于要牧养南下香港的会友，于是内战之后亦在香港发展教会事工，他们辖下堂会与战前已经在香港发展教会事工的英国循道公会辖下堂会长时间分开展发展基督教事工，到1975年循道公会和卫理公会才正式联合成为「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至于笔者所属的宣道会，在宣教士和刘福群牧师的帮助下，广西省梧州市的建道神学院于长洲复校。在神学院毕业生的帮助下，宣道会堂会开始被建立，当中岭恩堂和北角堂成为头两间内战之后最早成立的教会。无巧不成话，崇真会救恩堂和宣道会北角堂的成立时间刚好相差一百年，崇真会和宣道会分别于鸦片战争和国共内战之后才在香港发展事工、加上两间堂会分别是两个宗派于香港最早建立的教会之一；所以，笔者很喜欢拿这两间教会作为两次重要事件之后香港教会发展的象征。

除了这三个宗派之外，还有其它宗派在香港建立教会事工。在神学教育方面，两间于香港开埠初期建立的神学院—英华神学院和圣保罗神学院已经很早转变为英文学校(这两间中学还是现时香港名校之一)，之后香港接近一百年没有神学院。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神学院因着战祸迁往香港，到香港沦陷之后他们又迁回内地。到国共内战期间，一些神学院从内地迁往香港复校，当中包括伯特利神学院、信义神学院、神召会神学院、播道神学院和之前提及的建道神学院。另外有些神学院于内战之后不久成立，当中包括浸信会神学院、宣道圣经学院、中台圣经学院香港分校和香港神学院。一个原本没有神学院的地方于数年间有十多间神学院成立，数目增长的迅速程度实属少见。后来有些神学院结束(例如：中台圣经学院香港分校)、有些神学院合并(例如：宣道圣经学院并入建道神学院)、亦有些神学院转型之后重开(例如：信义神学院转变为信义宗神学院)。个中原因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但是以当时香港只是弹丸之地，人口亦不多(约二百五十万)；在需求不大和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出现上述情况亦不足为奇。不单止神学院事工，教会和其它事工都出现类似情况。一些差会和宣教士因着当时香港太多差会和宣教士，于是索性迁往日本或其它地方发展宣教事工。这些可以说是50至60年代香港基督教的独特情况。

正如上述所说，国共内战之后西方差会和宣教士迁往台湾、澳门和香港，这三个地方的基督教事工于之后十年间有明显的发展。至于中国大陆自从解放之后，基督教会被迫与国外教会截断关系，实行带有政治色彩的「三自运动」。之后虽然国内出现很多政治运动，国内信徒惨遭逼迫；但是国内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幅度较其余三个地方还要大，以致现时国内教会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牧者和属灵材料。现在当我们回想这件事时，我们会不禁觉得神的作为实在奇妙。当时的信徒可能会不明白神为何会容许他们屡遭共产党人士逼迫，亦可能会不明白为何神会容许无神论的共产党执掌中国政权；但是当我们看见台湾、澳门和香港的基督教事工于内战之后有明显的发展，中国的基督徒人数持续增长时，我们不禁要说一句：「神的旨意远超于人的所想所求」。愿将这篇文章分享给各位主内肢体知道作为主内的交流和互勉。

■回到目录

在1900年至1976年期间,国内基督教会共经历四次严重逼迫:分别是1900年的「义和团」暴乱、1922至27年的「非基运动」、1949至1954年带有政治色彩的「三自运动」和1966至76年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在上一个世纪里,国内教会差不多每廿五年便要面对一次严重逼迫。这个情况到1979年之后才有所改善。笔者已经于之前三篇文章里概述头三次事件的情况和分享个人感受,这次笔者希望就着「文革」的前因后果作一些分析。

根据陈明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和一些网页资料记载,「文革」的发生经过概述如下: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为「文革」制造了舆论基础。

—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于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写了一个经毛泽东修改同意的座谈会纪要。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1966年5月,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由于毛泽东不满意之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学术的批判,于是会议决定撤消这个小组,并且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小组认为当时的文化领域都是「黑线统治」,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会议认为必须对他们进行斗争。

—1966年8月初,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主要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毛泽东对「文革」的全面发动,全国党政机关开始陷入瘫痪状态。

—1966年8月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发动红卫兵「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斗争有历史背景,旧社会残余的学术界和文化界人物。「文革」正式展开,各地发生流血大武斗,掀起了对地主、富农、右派、政界和文艺学术界等人物的大批判。红卫兵声称为了革命「破四旧」,闯入富人、知识分子和高干官员家里。他们只要看见丝毫外国或知识的迹象,立即揭过天翻地覆,很多学者目睹自己以一生心血写成的手稿付之一炬。有著名小说家被活活打死、有老校长被指定扫厕所;甚至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贺龙、市长、省公安厅厅长、军队司令和各级主要官员都被虐待致死。

—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完成了全面夺权斗争的任务。当时,毛泽东认为经过两年多的夺权斗争,应当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

—1968年10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原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占总人数的71%。在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能够参加会议的只有40人。会议又给当时被折磨致不似人形的刘少奇一个70岁大寿的「生日礼物」—「永远开除出党」。到1969年11月,刘少奇带着周身痛楚和满腔怒愤郁郁而终。

—1969年4月,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九大」)。「九大」并没有结束「文革」,它只是标志着「文革」全面夺权斗争的结束,以及进入斗、批、改的阶段。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失败后逃走,飞机于蒙古失事坠落,机毁人亡。

—1973年中共恢复邓小平和一些「文革」时被打压的老干部的职务。

—1973年5月,「批林(彪)批孔(孟)运动」大规模开展,「文革」重新推向高潮。

— 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于北京召开「批林批孔」会员大会，会中江青等人伺机攻击周恩来。之后「四人帮」不断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藉此夺取更大权力。

— 1976年，读中国近代史的人士必然关注的一年。1月8日，受万人景仰的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华国锋代任总理。3月下旬开始，全国各大城市纷纷悼念周总理和声讨「四人帮」。4月5日，在「四人帮」的策动下军队镇压各地群众，后人称之为「四五天安门事件」。7月6日，委员长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廿四万二千人死亡，十六万四千人受伤。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中共粉碎「四人帮」集团，历时十年的「文革」正式结束。

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只能很简略概述「文革」。至于「文革」的死亡人数则众说纷纭，由数百万至二千万不等，至于受伤和受迫害人数则更难以估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事件的主要针对对象不是基督教或宗教界，而是渗透至每一个阶级界别和每一个地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穷乡僻壤农民都无一幸免。故此，笔者不打算着重反思事件的原因，反而笔者希望着重反思事件的后果。

经过十年「文革」之后，全国元气大伤、一直受到中共监视和迫害的国内教会亦不能幸免。当时很多香港和其它地方的华人信徒都害怕国内教会从此很难再站起来，结果却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国内教会不单止迅速地站起来，而且信徒人数增长速度更远超于「文革」之前，甚至比香港和其它地方的华人信徒增长速度高出很多。笔者阅读很多牧者和学者的分析，他们的意见和笔者类似。大家都认为「文革」期间基督徒在被迫害和死亡威吓之下仍然坚持信仰，这种坚毅不屈的精神深刻地印在逼迫他们的红卫兵和身边人士的脑海里；所以当教会恢复聚会之后，很多人涌往教会寻求信仰。

使徒彼得曾经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前 1:6-7）。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同样会面对逆境和苦难，分别是基督徒有神的安慰和圣灵的帮助；所以，理论上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有喜乐和生命力（实际上要视乎个别基督徒的灵命而定）。这种分别在面对逆境和苦难时会特别明显。以「文革」为例，由于基督徒与众不同的生命力和见证，很多非基督徒对基督教都有重新的评价。原本一场打击国内教会的「革命」反而帮助教会能够作更美好的见证和使更多人听信福音，笔者相信很多昔日红卫兵和帮凶都会始料不及。

正如本系列第七篇所说，神的旨意远超于人的所求所想。当我们以为苦难会打击某些信徒或教会时，他们却反而因着这些苦难得着帮助。当然，我这样说不是鼓励基督徒向神祈求苦难；但是，我们亦不应该埋怨神为何使我们面对苦难，尤其是当自己的际遇比别人差的时候。俗语说：「各有前因莫美人」，同样基督徒应该说：「各有神因莫美人」。神对每个基督徒都有不同的计划和旨意。不论我们面对顺境抑或逆境、施予抑或苦难，这些都是神所赐的。神自有他的计划和旨意，我们不应该质问神，亦不应该祈求神使我们免去困难。我们祈祷时应该如主祷文所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10）当我们面对逆境或者苦难时，我们可以思想神是否责打我们、亦可以思想神是否锻炼我们成为被火试验时仍不会坏的金子、又或者思想神可能有其它的计划和旨意、当然最重要是祈祷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他的计划和旨意。愿将这篇文章分享给各位知道作为主内的交流和互勉。

■回到目录

笔者曾经参加某教会的堂庆崇拜，当中牧师于讲道中指出教会生活应该包括四方面；分别是敬拜(Worship)、教导(Instruction)、团契(Fellowship)和传福音(Evangelism)。如果我们将这四个英文字的第一字母凑合起来，便是WIFE，正好符合教会是基督的妻子(WIFE)的意思。故此，笔者便用这四个英文字母来表达笔者对华人教会于第三个一百年的期望。虽然，这些期望在其它信徒眼中只是老生常谈；但是，笔者仍然希望借着这篇和之后的三篇文章分享意见作为主内的交流和互勉。

自从中世纪以来，天主教一直局限于欧洲西部发展。马丁路德和其它宗教改革家于十六世纪脱离天主教成为现今的基督教。虽然，当时欧洲的基督教会有很多宗派；但是，这些宗派都充满着浓厚的欧洲文化。到十七世纪很多欧洲基督徒移民北美洲，基督教亦随之传往新英格兰和其它北美洲地方，这些北美洲的基督教会承袭欧洲教会文化转变成北美洲的基督教文化。当时由于基督教是随着大批移民传往北美洲，所以在文化适应方面问题不大。到十八世纪后期「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积极推动海外宣教事工之后，欧美宣教士开始海外跨文化的宣教工作。

当欧美宣教士往中国宣教时，他们除了要适应气候和生活环境的差异之外，还要适应文化的严重差异。以语言为例，欧美国家的语言都是以字母为基本单位、然后是文字、句子和段落等。中国语言却不是以字母为基本单位，所以学习方法当然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所以笔者十分佩服马礼逊可以来中国十七年之后已经翻译整本新旧约圣经)。而另一个最大问题是中国拥有几千年文化，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讲究和谐融合；而基督教文化却着重惟我独尊和谦卑顺服，加上当年基督教是借助武力传入中国的；所以，我们可想而知为何当年基督教传入中国时面对这么多冲突。

虽然，这篇文章不是着重讨论宣教；但是，敬拜和宣教一样讲求文化的适应。当十八世纪基督教初入中国时，由于当时华人信徒中缺乏音乐家，并且他们对敬拜缺乏认识；所以西方宣教士将他们的敬拜模式放在华人教会里，华人圣诗亦是西方圣诗翻译成中文，这是无可厚非的。当二十世纪初西方宣教士鼓吹华人教会要自治、自养、自传(简称「三自」)和本色化之后，一百年来不论两岸四地(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抑或其它地方的华人教会、不论带有政治性抑或非政治性；大部分华人教会和机构在行政架构上都能够达到「三自」和本色化的目标。但是笔者觉得在敬拜模式和圣乐方面仍然带有西方的文化色彩。以诗集为例，现在教会用的诗集当中，很多圣诗仍然是欧美圣诗填上中文歌词，中国人作曲的作品只占很少部分。无可否认这些圣诗能够触动人心，在崇拜时唱这些圣诗对整个敬拜气氛的影响不太；但是，以中国几千年于音乐和艺术方面的悠久文化，加上近年中国的音乐和艺术家人才辈出，为何华人教会的敬拜模式和圣乐方面仍然不能够「中国化」呢？当然，笔者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华人教会像「文革」般将以前的圣诗和诗集完全抛弃；但是，当世界各地的潮流文化不断转变时，教会在敬拜模式和圣乐方面是否应该尽量适应外面的潮流文化呢？

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4:24)任何聚会敬拜程序的目的是帮助会众更投入敬拜和荣耀神；所以，教会设计崇拜和其它聚会的敬拜程序时应该留意怎样的程序才是最適切达到这个目的。笔者相信现今华人信徒有能力设计适合华人教会的敬拜模式、亦有能力创作更多悦耳动听和荣耀神的圣诗。真理和圣经原则应该永恒不变的，表达方法和模式却应该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华人信徒不应该嫌弃旧有的经典圣诗，但是应该创作更多华人的经典圣诗，

藉此帮助华人信徒更投入敬拜和荣耀神。

另一方面，圣诗除了可以帮助信徒投入敬拜之外，亦可以帮助教会发展教导、相交和传福音的事工。圣诗歌词除了可以帮助信徒表达感恩和赞美的情绪之外，亦可以帮助信徒将圣经真理牢牢地记在心中。以圣经金句为歌词的圣诗便是很好的例子，这方面华人信徒的音乐创作人应该留意。圣诗亦可以帮助信徒向主内肢体表达自己，达致相交的效果。在传福音方面，容易颂唱和歌词易明的圣诗能够帮助非信徒更认识福音真理和将圣诗歌词记在心中。这方面亦是笔者鼓励华人信徒创作圣诗的原因，始终在相同文化环境下生活才最清楚身边人士的喜好、缺乏和需要。愿将这篇文章分享给弟兄姊妹知道，作为主内的交流和互勉。

■回到目录

在基督教来华的第三个一百年里，笔者期望华人信徒的基督教教育能够深入化，笔者所指的深入化包括三方面；分别是地方普及的深入化、信徒知识的深入化和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深入化。

正如本系列第八篇所说，「文革」之后国内基督徒数目剧增，牧者和神学生的数目却没有相应地增长，加上「三自运动」和「文革」期间出现神学训练的断层，以致现时国内教会的牧者数目严重不足。不单如此，国内的属灵材料亦不足够。另一方面，在僻远的穷乡僻壤，很多农民和适龄儿童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以致他们的知识水平偏低，有些则近乎文盲。即使我们将圣经和属灵材料送给他们，若果没有人教导他们，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学习。故此，笔者期望在基督教来华的第三个一百年里，不单止一般教育可以深入至中国每一个阶层和角落，基督教教育亦可以深入至中国每一个阶层和角落。现在香港某些慈善团体所举办的「希望工程」便是很好的例子，近年香港一些基督教机构亦于内地发展教育项目。在基督教教育方面，近年越来越多香港教会的牧者和信徒定期往内地进行圣经知识和文化交流，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笔者期望随着中国逐渐富强、国民的生活质素普遍得到提升、一般教育能够深入至中国每一个阶层和角落。笔者亦期望随着中共政府越来越开放，香港和其它地方的华人教会和信徒有更多机会深入至中国每一个阶层和角落协助发展教育项目和进行圣经知识和文化交流。最终达致中国和全世界所有华人社区都能够发展完善的基督教教育。

除了基督教教育能够深入至中国和全世界所有华人社区之外，笔者亦希望不论两岸四地抑或其它地方的华人社区，华人信徒能够深入研究圣经真理和神学知识。当十九世纪初西方宣教士来华宣教时，印刷技术十分落后、华人牧者亦不多、以致基督教教育发展困难、华人信徒很难认识圣经真理和神学知识。两百年后的今天，华人信徒的困难并不是很难认识圣经真理和神学知识，乃是很难抽出时间认识圣经真理和神学知识。现在很多人都说廿一世纪的世界是知识型经济和科技爆炸的世界。基本人只要我们的家中或办公地方有计算机和互连网络，这样即使足不出户都能够知道天下事；所以，华人信徒在寻找圣经真理和神学知识方面绝对不是难事。问题是现在信息过多，华人信徒在众多信息的选择下未必会用太多时间寻找圣经真理和神学知识。近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广「资源增值」，鼓励市民利用工余时间在工作知识方面充实自己。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信徒很难抽出时间深入研究圣经真理和神学知识。现在全世界的华人信徒群体中教导圣经真理和神学知识的网页、光盘和其它媒介何其多，问题是华人信徒是否愿意深入研究。故此，笔者期望在基督教来华的第三个一百年里，在信息科技爆炸的世纪中华人信徒仍然愿意深入研究圣经真理和神学知识。最终达致全世界所有华人信徒都愿意深入研究圣经真理和神学知识。

除此之外，华人的神学理论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在音乐、艺术、哲学、文学和其它方面的成就都值得中国人自豪。现在很多西方学者都会主动学习中国文化，这方面证明中国文化有值得可取的地方。中国的基督教是欧美宣教士来华宣教的成果，当中包含一些西方思想和文化。现在全世界的基督教书籍亦以西方基督教思想为主导。虽然，圣经只有一本、真理亦只有一个；但是，演译和诠释方法却有很多种。既然中国历年来有这么多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作品，华人基督教学者何不引用这些作品来演译和诠释神学理论呢？他们甚至可以将中国历史悠久的宗教（例如：佛教、孔教）和基督教相比较，藉此使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更丰富。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帮助华人信徒用更中国化的演译和诠释方法向华人传福音、另一方面亦可以使神学理论更丰富和同时兼备中西方文化、并且最终达致基督教的神学理论能够深入至中国文化的各部分来作出演译和诠释。

中国有三多；地方多(全球第三大面积国家)、人多(全世界五分一人口)和文化作品多(五千年文化)。笔者期望在基督教来华的第三个一百年里，完善的基督教教育能够深入至中国和全世界华人社区的每一个阶层和角落，全世界数以千万计(将来数以亿计)的华人信徒都愿意深入研究圣经真理和神学知识、并且基督教的神学理论能够深入至中国文化的各部分来作出演译和诠释。愿将这篇文章分享给各位主内肢体知道作为主内的交流和互勉。



不论是华人教会抑或西方教会都常常强调团契和彼此相交，亦强调主内合一。这里笔者所指的团契合一化分为两方面；分别是华人教会信徒的合一化和中西方教会的合一化。

正如本系列第九篇所说，自从二十世纪初西方宣教士鼓吹华人教会要自治、自养、自传(简称「三自」)和本色化之后，一百年来不论两岸四地抑或其它地方的华人教会和机构，大部分在行政架构上都能够达到「三自」和本色化的目标。当华人教会脱离西方差会自立之后，教会与教会之间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合并或联合发展基督教事工。华人教会之间不单止有共同信仰、异象和使命、还有共同的民族血统、语言和文化；所以，理论上华人教会合并或联合发展基督教事工的问题不大。

国内教会因着政治理由已经完全达致行政架构的合一。至于笔者身处的香港，随着战后经济不断发展和华人教会逐渐自立，教会与教会之间越来越多思想合作发展基督教事工的可能性。1975年美国卫理公会和英国循道公会在香港的堂会合并成为「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76年于香港成立的「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简称华福)更可以说是第一个世界性推动华人福音事工的跨宗派和跨地域机构。除了行政架构的合一之外，香港的华人教会之间亦会联合推行事工。1976和90年于香港政府大球场举行的「葛培理布道大会」便是很好的例子。屈指一算，1975至76年香港基督教界有三件事见证华人教会的成长、自立和合一。

从上述事件看，华人教会和信徒的合一化是可行的；但是，实际上面对的问题亦不少。笔者曾经听见有人说：「一个中国人可以赢一个日本人，但是一群日本人却可以赢一群中国人。」这句话充分反映出中国人比较难团结合作的特性。虽然，中国人先说情后说理的特性可以帮助他们建立和谐的关系；但是，这种特性亦会导致中国人发生分歧时变得情绪化和暴力化。当我们观察美国和台湾的政客举动时便会发现当中的分歧。美国政客开议会时只会有言语的争拗，而且他们都尊重公平的表决制度；所以，我们很少听闻美国的议会有暴力冲突的情况。台湾的政客却不然，他们经常开会时发生暴力冲突，而且还阻止开会和表决的进行。故此，中国人的特性某程度上会阻碍他们的合作。在华人教会方面，人际关系冲突经常变得情绪化。中国人很注重「面子」，华人信徒亦然。当情绪化冲突过后由于他们爱「面子」和不愿意认错，以致双方比较难和好如初。多少华人信徒离开教会、多少教会分裂都是由于这些原因。故此，笔者期望在基督教来华的第三个一百年里，华人教会和信徒之间能够尽量减少情绪化的举动，为基督元首的缘故联合起来为神的国度打美好的仗。

除了华人教会之间联合起来发展基督教事工之外，笔者亦期望华人教会能够和其它国家和种族的教会联合起来发展基督教事工。正如本系列第十篇所说，人类即使足不出户都能够利用计算机和互连网络知道天下事，同样华人信徒能够利用计算机和互连网络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信徒联络。圣灵只有一个、身体亦只有一个；不同国家和种族的教会在神里面都是基督的身体。华人教会既然已经自立，他们应该与昔日传福音给他们的西方教会和其它同得福音好处的教会联合起来，为神的国度打美好的仗。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夸国家、夸宗派和夸种族的基督教联合事工，但愿这种联合事工在基督教来华的第三个一百年里能够继续发展。不过，无论是华人教会内发展基督教联合事工抑或与其它国家和种族的教会发展基督教联合事工。有一个最大难关需要解决，这个便是怎样与国内的教会发展基督教联合事工，这个是关乎政府干预和内部矛盾的问题。

按华人信徒人数计算，粗略估计国内教会的人数占全世界人数比例九成以上(国内华人信徒人数超过四千万，其它地方的华人信徒人数加起来不足五百万)。即是说现时华人教会的联合事工只是占全世界华人信徒的很小比例。如果与国内教会合作发展基督教事工，国外华人教会至少要面对两个问题。首先，国内教会主要分为官方和非官方。两者之间因着某些原因多年来积怨甚深，国外的华人教会和信徒很难帮助他们改善关系。如果任何一间教会或信徒与其中一方合作，这样差不多等于与另一方划清界线。这种官方教会、非官方教会和国外华人教会之间的「三角关系」，笔者预计可以预见的将来都很难解决。其次，中国的官方教会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即使属于中国其中一个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华人教会和国内官方教会合作在现阶段亦只限于学术和文化的交流，更何况其它地方的华人教会。如果和非官方教会合作便会影响和中共政府之间的关系，将来便很难与官方教会合作。这种华人教会之间的矛盾使笔者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全世界所有华人教会无法联合发展基督教事工。国外的华人教会都出现上述情况，其它种族的教会更不用说。他们除了要面对上述问题之外，他们还要面对种族的问题。正如之前本系列其它文章所说，昔日基督教是借助西方武力传入中国的。1949年中共建国之后刻意断绝国内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如果现在外国教会重提与国内教会合作，这样中共政府会怎样想呢？民族意识强的中国人又会怎样想呢？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除了祷告之外，华人教会无法做任何事情解决上述问题。笔者期望神大能的手彰显帮助华人教会在基督教来华的第三个一百年里达成上述目标。

■回到目录

在基督教来华的第一个一百年里，华人信徒因着福音使命领受西方宣教士传扬的福音；在第二个一百年里，华人教会逐渐自立和成长；这样在第三个一百年里，华人教会是否应该延续这个福音使命向世界各地人民传扬福音，叫他们同样领受福音的好处呢？

耶稣吩咐我们要将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太 24:14)。圣经新约有多处经文吩咐基督徒要履行大使命将福音传遍普天之下。二百多年前「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因着这个使命积极推广海外宣教运动，他亦身先士卒于 1793 年往印度宣教。现在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差派最多宣教士往外国的国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其中一个基督徒人数最多的中国，华人教会和信徒应该怎样响应这个使命呢？接近二百年前马礼逊和一群西方宣教士为了履行这个使命千辛万苦来中国传福音，当中有些宣教士在航行途中已经离世、有些因着水土不服、「义和团」暴乱或其它原因离世、能够平安回国的宣教士寥寥可数(笔者因着这些原因写这系列文章向他们致敬)。他们为神和中国人的缘故牺牲这么多，二百年后的今天华人教会和信徒应该怎样响应呢？

自从 1974 年 7 月于瑞士洛桑举行的首届普世福音会议之后，华人教会积极响应普世宣教事工，1976 年于香港成立的「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简称华福)便是第一个世界性推动华人福音事工的机构。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华人教会已经自立和成熟。华人教会和信徒应该延续这个使命，将福音传给世界各地人民知道，使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1970 年代香港有数间差会成立，香港教会逐渐意识到普世宣教的异象和使命。但愿在基督教来华的第三个一百年里，这个异象和使命能够继续在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和信徒心中生根成长。

除了将福音传遍天下之外，福音国际化还有第二重意义。那是改变中国和世界各地非基督徒的信念，使他们知道基督教信仰不是源于西方、亦非他们所独享。按着民族血统来说，耶稣是属于亚洲的犹太人、十二使徒、初期教会领袖和保罗等都是犹太人。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之前，福音只是传到地中海东岸和土耳其一带。之后福音大致上向西传播。先是非洲北部和整个欧洲、十六世纪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福音传到美洲、十九世纪开始福音传到中国和印度；近年普世教会逐渐关注回教国家的宣教工作，福音传回中东和北非，二千年来福音的传播路径仿佛环绕地球一周。我们可以从这个传播路径得知基督教起源于中东，只是后来回教势力占领中东，基督教才给人起源于欧美国家的感觉。故此，基督教不是「洋教」，乃是亚洲人的宗教，耶稣更不是「洋菩萨」。昔日基督教经常与西方帝国和武力扯上关系，以致基督教经常受到中国人的排斥。「义和团」暴乱和「非基运动」已经使华人教会和信徒知道基督教被视为「洋教」所带来的祸害；所以，身受其害的华人教会和信徒应该叫中国和世界各地非基督徒知道基督教不是「洋教」，乃是亚洲人的宗教。基督教的福音和信仰是全世界人民都可以拥有的，在神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基督教绝对是全世界的宗教。

「199 系列」写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三百多年前荷兰宣教士借着武力威吓台湾人相信基督教，结果三十多年的宣教努力并没有对后来的华人基督教事工带来显著的影响。到十九世纪初期马礼逊和其它欧美宣教士来中国沿海地区宣教时受到满清政府的严厉禁止和澳门天主教会的阻挠。有些宣教士为了向这个封闭传统的国家传扬福音，竟然赞成英国和其它国家侵略中国。虽然，之后欧美宣教士受到保护，福音得以传扬；但是，基督教是西方侵略工具的负面印象却根植于很多中国人的心中。若不是当时中国的军力不及欧美国家，基督教宣教士和信仰早已重蹈覆辙被赶出中国领土。

作为华人信徒而言，我们应该感谢神当年帮助基督教信仰可以继续遍及中国呢？抑或埋怨神当年容许西方烈强可以继续侵略中国呢？对于十九世纪末期「义和团」暴乱和二十年代中期的「非基运动」对国外宣教士、国内教会和华人信徒所造成的伤害，我们应该形容为「无妄之灾」、「撒旦的攻击」和「苦难的操练」呢？抑或是「咎由自取」、「神的惩罚」和「受伤的反省」呢？有时真的很难一概而论。后来中国共产党掌权，国内基督教遭受最少两次严重的攻击；分别是五十年代初被迫与国外教会完全截断联系和六六年开始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次事件对国内教会造成的伤害简直难以估计，但是之后国内基督徒人数的增长速度则更加难以估计。昔日支持无神论和仇视基督教的人士，今天会热切追求基督教信仰；昔日视基督教为西方势力入侵的人士，今天视基督教为天国权柄的扩张；当中的转变不单止是昔日的共产党人士，今天的华人信徒亦难以解释。

当我们回顾这段两百年中国基督教历史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展望中国基督教未来一百年的发展呢？笔者提出基督妻子(WIFE)的四化期望；分别是「W敬拜适切化」、「I教导深入化」、「F团契合一化」和「E福音国际化」。其实，正如笔者于这系列第一篇文章所言，这系列只是笔者运用自己有限的圣经和历史知识就着二百年来一些重要事件作简单的评述和分享一些愚见。笔者不是甚么华人基督教的杰出学者和牧者，笔者亦不敢和他们相提并论。笔者将这系列文章定名为「199」的原因是笔者认为很多基督教的杰出学者和牧者比自己更有资格撰写基督教来华二百周年的纪念文章，所以不用「200」而用「199」。笔者只是按着自己的恩赐和从神的领受尽力响应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这个历史时刻。笔者希望所有华人信徒亦按着他们的恩赐和从神的领受尽力响应这段历史时刻。笔者就此搁笔，让我们一起带着欢欣喜乐和感恩的心情来迎接基督教来华二百周年吧！

■回到目录